



羅香林先生任教香港大學時代

一九六五年一月接任中文系教授時攝影

目 录

罗香林教授传略·····	罗桂祥(一)
罗香林教授遗著选登	
客家源流考·····	罗香林(一一)
绪论·····	(一一)
中华民族的构成和演进·····	(一四)
中华民族中客家的源流和系统·····	(二三)
客家的分布及其自然环境·····	(六二)
客家语言的特征·····	(八四)
结论·····	(一一五)
乙堂丛著八种自序·····	罗香林(一一七)
客家迁移及分布地图序·····	罗香林(一二三)
对罗香林教授学术评介文章选登	
悼念罗香林先生·····	李 璜(一二五)
——对珠海书院中国文史研究所全体学员讲话	

恩师罗香林教授研究史学之伟大成就.....余伟雄（一三三）

——敬献于香林师逝世周年纪念之辰

罗元一教授谀.....陈桢（一四二）

罗香林教授对兴宁地方文献之贡献.....兴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一四六）

罗香林教授著作目录.....（一四九）

罗香林教授在各地报刊发表的论文、考证、传记、序跋等目录.....（一五三）

罗香林教授亲属概况.....（一七二）

后记.....（一七三）

罗香林教授传略

罗桂祥

罗香林教授，字元一，号乙堂。一九〇六年九月十一日巳时出生于广东兴宁县宁新镇水楼下石陂窝祖屋。为豫章罗氏后裔，兴宁落基始祖小九二十一世孙。父讳师扬，字幼山。以诗古文辞及史学教授岭表，著有《希山丛著》八卷。母邓氏。昆仲五人，居幼。罗教授自幼勤奋好学，每试辄名列前茅。在家颇能体贴慈母劬劳，理解耕耘之苦。

一九二四年夏，他在兴民中学毕业后，即负笈上海。一九二六年夏，复舍上海政治大学学籍，考取北京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先后从游陆懋德、孔繁霖、刘崇鋈、朱希祖、钱玄同、陈寅恪、孙璪堪、张星烺、冯友兰、许地山诸教授及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等，毕生效法诸师之治学精神与态度。他从事学术研究，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取得成就，实与诸师精心培植攸关。他在清华肄业时，被推为一九二八学年度《清华周刊》总编辑，常以罗汉笔名发表文章。

一九三〇年夏，他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升入研究院，专治唐史与百越源流问题。翌年六月，其父病逝，乃请求休学，居家守制，办理丧事，并整理乃父遗稿。年末，回研究院继续肄业，兼读

邻校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学部，接受洪业教授指导。一九三二年一月，获哈佛燕京学社奖金，赴华南考察民族，与人类学家许文生博士，于广州从事蛋户之体质测验，凡四阅月。其后又赴东北江考察客家文化。九月，返清华，燕京两校上课。十月接国立中山大学聘约，任校长室秘书，兼广东通志馆纂修。乃于月杪前往广州任职。

一九三三年，他改任中山大学副教授，兼编辑学校文史研究所月刊。他于授课之余，勤奋撰写学术论文，发表于该月刊。是年九月，专赴中山县翠亨村考察孙中山先生故里的文物古迹，取得孙中山家世之初步认识。接着又与海南学者陈月波，王兴瑞、谢英白、陈大年等发起组织「琼崖黎苗文化协进会」。他可说是我国首先以科学方法辅导粤中青年研究民族问题之学者。年末，撰著《客家研究导论》，出版于广州。该书凡数十万言，详述华夏民族中客家的源流与系统，客家五次大迁徙的原因和经过，客家人的分布，客家语言的特征，以及客家文化及其特点，资料丰富，引证翔实。

一九三四年秋，他辞去中山大学各职，执教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兼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审核事务。其时常随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考察六朝陵墓，在南京近郊发现六朝陵墓十三处，他协助测量摄影和钩稽考证。朱希祖精湛之考古学识，给了他很大的启迪。

一九三五年八月，罗教授与朱希祖女公子朱倓女士结婚于南京。暑假参与津浦铁路发动之泰山旅行团，专车北上，游长清灵岩寺与泰安岱庙，旋登泰山玉皇顶。归途经曲阜、谒孔庙，参与祭孔大典。九月，返校授课，并兼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教授。其于暑假之间，还应正中书局之约，编写《高中本国史》课本上中下三册。后又将课本增删而为《中国通史》上下二册，作为大学用书。

一九三六年秋，他返粤任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馆长，兼任中山大学副教授。长馆二载，与馆中同仁创办《广州学报》季刊与《书林》半月刊。旋又与黄文山创办《更生评论》，专登政论及学术文化

评论文章，对开创粤省学人研究风气有良好影响。罗教授在整理馆藏清季著籍与广东文献时，发现林凤超著《坤甸历史》和《兰芳公司年册》，经研究知罗芳伯在西婆罗洲所建大总制，实为共和国政体，而罗芳伯竟为梅县石扇人氏，为石扇开基始祖九清公十四世孙。于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三年）泛海至西婆罗洲之坤甸，组织兰芳公司，从事开辟采金。后以协助苏丹平定地方叛乱，为侨居群众所拥护，创立兰芳大总制，罗被推为首任总长，树立民主先声。罗教授认为如此富有开拓精神，又具有先进思想之客人，实应撰专书以志其盛迹，乃著《西婆罗洲罗芳伯所建共和国考》问世。自是罗芳伯之事迹乃大明于世。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在大亚湾登陆，广州告急。他乃日夜简选馆藏善本与贵重图籍，船运往桂，甫抵苍梧，广州即告沦陷。旋雇船溯柳江将图书运抵桂平存放。珍贵图籍，幸免战火。嗣后又挈妻儿回关黔蜀，既访名胜古迹，复考察沿途风土人情，对民族史料，尤为关注。每夜将见闻所得，笔之于书。并谓：遍地皆学问，无处不文章。

一九三九年春，他全家安抵重庆，住歌乐山外父家。常与外父朱希祖商讨学术文化、史料、史实之收藏与使用问题，还建议当局筹设国史馆与档案库。后经各方敦促，国民政府终于一九四〇年初成立国史筹备委员会，朱希祖为筹备委员兼总干事。他曾参与拟具各种条例，使会务顺利开展。不久，罗教授赴云南澄江任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兼研究院指导教授。翌年九月，中山大学由滇迁返粤北。他率领文科研究所部分研究生先抵桂林，考察文物古迹。于桂林西山观音峰发现唐高宗调露元年（六七八年）阿闍佛造像，及其有关石刻（简称桂林摩崖佛像）。此一发现，对罗教授后来系列研究佛教自印度循海道传入越南与两粤之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嗣后又对广州光孝寺内之前代遗迹如经典译述、高僧往来、铁塔、佛像，以及现在仍然生长良好之柯勒树与菩提树，潜心研究。发现由海道传入两粤之佛教，无论其宗派演变及艺术发展，皆与由西域传入者，有其不

同系统与独特地位，并由此而阐明其与中印海上交通发达之关系。此乃罗教授数十年来研究唐史之重大成就之一。

罗教授在桂林逗留期间，以室人朱倓分娩，曾代授她在广西教育研究所中国历史教学法课程。经广西教育研究所贾援、彭林葵告知，福建省德化县存有与宋末蒲寿庚家世攸关之《蒲氏家谱》。乃嘱贾、彭两君写信给德化张玉光、金宝德二阿訇，设法将《家谱》内容抄寄。罗教授得此珍贵史料，即对蒲寿庚进行系统研究。蒲寿庚，西域人，回教徒。曾任宋代泉州提举市舶使，兼福建沿海都制使，对宋末抗元成败，关系很大。日人桑原骥藏曾著文详为论述。但该书对蒲氏上世之迁移源流，与其家族之传演关系，仅略加推测，为后世学者所诟。罗教授根据新发现蒲寿庚家谱，以及后来陆续搜集到的有关资料，先后撰成《蒲寿庚传》、《蒲寿庚研究》两部专著及论文十余篇。其著作及论文，对研究宋元历史之学者，大有帮助。对日人桑原氏名著《提举泉州市舶使西域蒲寿庚事迹考》一书，也起着补阙作用。

一九四〇年末，他回粤北乳源中大文学院授课。五月，他借得紫金县忠坝乡孙桂香家藏《孙氏族谱》旧钞本。发现这一族谱为与孙中山先生上代有关之唯一族谱。从《孙氏族谱》中，证明孙中山上代，原居广东紫金，以抗拒满清事败，迁居增城，旋再迁香山（即今中山县）。历代义不仕清。以此可知孙中山之家世源流与其思想渊源。乃撰著《国父家世源流考》。

一九四二年初，罗教授应国民党中央之邀，赴重庆筹划学术会议。他建议以专题讲论方式，进行学术讨论，以提高学术研究风气。首讲历史研究即由他作中心发言。分五讲：一、民族成长；二、社会发展；三、治乱因果；四、文化演进；五、人才消长。罗教授于重庆工作儿近四载，尝兼国立政治大学研究部教职，又曾与史学家李济、傅斯年、金毓衡、顾颉刚、黎东方等发起组织「中国

史学会》。下设多个学术团体，指导全国历史学术研究。他曾在所属唐代文化研究会演讲《唐代文化之认识》，对唐代贞观之治、天可汗制度、佛教之传入与僧人玄奘、神秀，佛教对唐代之政治影响，唐代文学之国际发展，以及唐代之社会风气，多有阐发。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广东省政府亦于是时改组。罗教授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省立文理学院（现华南师大的前身）院长。他以主要精力，首谋学院之恢复与发展。翌年春，创办《文理学报》，刊载学院教授之学术研究成果，提高学院之研究风气。他在省府委员任内，尝探讨广东战后建设问题，并以总干事名义主持广东省建设研究会日常工作，创办了《广东建设研究》季刊，刊载广东建设之学术论著与建设之具体措施。对广东沙田问题亦有较广泛深入之探讨。

与此同时，罗教授对广东省文献事业也很关注和支持。国民党立法委员简又文就创立广东文献馆问题，和他交换意见，他极表赞同。一九四六年初，广东省府例会通过由他提议的设立广东文献馆提案。九月，广东文献馆成立。叶恭绰、高剑父、简又文、罗香林等九人为理事，罗卓英任名誉馆长，简又文为馆主任。该馆成立以后，对维护和发展广东文献事业，作出显著成绩。征集了广东最古之通志，收购了南洲书楼所藏广东著述珍本四百余种，其他文籍二千多部，共六千余册。还搜集了大批古物及拓本。馆内经常陈列和宣扬文献。

一九四七年九月，他辞卸省府委员及所兼职务，返中山大学专任教授。翌年复兼广州国民大学特约教授，并为香港《星岛日报》创编《文史副刊》。其近作亦多借此园地发表。此外，还担任了广东文化大学研究所史学部主任。这一时期他身兼数职，为培育英才，费尽心力。

一九四九年六月，他又辞去中山大学教授等职，挈家移居香港。先后任教于香港文化专科学校、

新亚书院、广大书院、官立汉文学院。一九五一年秋，受聘为香港大学中文系兼任讲师。一九五二年秋，改为专任讲师。嗣后则任教授、中文系主任、讲座教授、东方文化研究院院长，并兼任亚洲研究中心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前后共十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底退休。该校教务会议及校务会议通过，授予他终身职名誉教授。

他在港大十七年中，除平日认真教学与勤奋著述外，仍积极从事考古工作与学术文化活动，致力于传播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香港、九龙为我国南疆边陲。秦汉以还，即为我汉民族拓展所在。历代之文事武功，均于此地遗留踪迹。自十五世纪后，来自西方之新文化、新思想，向由印度洋、太平洋先流入南中国。其中香港、九龙、澳门，又为我国与西方文化最早接触之区。亦为我国人民抵御帝国主义坚船利炮侵略之前哨阵地。因而保存着大量之文物、古迹及历史资料。罗教授对此钩沉考核，不遗余力。在古迹文物集中之郑屋村、屯门，曾多次访问考察。旋于郑屋村发现汉墓与出土文物，并作出鉴定与评价。他于郑屋村对香港地区的发展史，进行过深入调查，对九龙新界史迹为之细致考访，对香港屯门与其地自唐至明之海上交通史实为之翔实考证，对香港新发现之南明永历四年所造大炮为之考述，对香港之打石史迹与香港之建设及其文化意义为之阐发，对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等问题均撰成专书或专论为之介绍，对香港之汉学研究、香港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关系、香港之学术发展与近年来之研究成就及其趋向等问题均曾深入研究。特别是对香港在中国历史上之地位给了重新评估。港人多谓罗教授是对香港历史与香港文化研究最力的学者。

一九五六年秋，他赴欧洲，第一次出席第九届国际少壮汉学家会议，宣读其论文《中国社会之演进与中国历史分期之关系》。一九五七年秋，又赴欧洲，出席第廿四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九月，

转往马堡，出席第十届国际少壮汉学家会议，宣读其论文《香港与中国新文化之关系》。十二月往台北出席中国学术计划委员会成立大会及第一次会议。会上罗教授对我国学术研究工作提出多项有益建议。一九六〇年十月再往台北出席东亚学术研究会会议，会上报告了《三年来香港与东亚学术研究有关成就与趋向》，并讨论了关于东亚学术研合作问题。一九六三年八月至十一月，他享受港大之休假待遇。先与室人朱筠赴日本东京、横滨、奈良等地考察当地教育与学术研究情况。后只身飞美国西雅图、三藩市、纽约、新泽西、麻省、纽海纹等处大学及侨团访问，考察及演讲。最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其东亚图书馆所藏中国族谱，搜获了许多珍贵资料。

一九六五年春，他复受聘为港大中文系讲座教授。至一九六六年十月，发表就任讲座教授演讲，题为《中国族谱研究》，系英文讲稿。这是他学术研究之重大成果。他自称治中国史学，虽受近世史学潮流影响，然亦喜为中国民族之迁移及混合历史之研究，深觉中国的正史与方志，其载述往往仅及于朝政之实施、制度之创立、地方之建置、财政之丰歉、人物之得失及边民之入居而已。而于各姓氏之转徙，与各民族之混合同化，则付阙如，故非以各姓族谱求之不可。故他平日治学，亦充分利用族谱，进行专业研究，由是而著成《客家研究导论》、《国父家世源流考》、《太平天国洪天王家世考》、《蒲寿庚传》、《傅秉常家世及其与香港大学之关系》等书。他还将历年搜集之客家各姓族谱数十种，编成《客家史料汇编》第一册。旋于国际史学会议中，指出族谱之研究方法，使中国谱乘之学有其研究对象与范围，成为历史科学中一个重要分支。

一九六七年六月，台北中华学术院鉴于罗教授十多年来在学术上，以及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之重大贡献，特颁授哲士衔。同年十一月，港大东方研究院与现代亚洲研究所合并，改组为亚洲研究中心，罗教授随之任为该中心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亚洲学术文化之研究事务，对台湾、日本、韩

国、印度、东南亚各国以及西南亚诸国之学术研究团体，给予协助解决其学术文化之发展等问题。

一九六八年八月底，罗教授任香港大学讲座教授期满，宣告退休。去职后，港大中文系主任由马蒙教授接充。马教授与他在港大共事十年，知之且深，仪之弥切，特主持荣休仪式。又值其六十二岁寿辰，为留永久纪念，特编辑《寿罗香林教授论文集》，海内外学者钱穆、陈槃庵、简又文等二十余人亦著文纪念。

罗教授在港大退休后，虽每周仍教该校研究生课数节，而港属一些学术研究机构与高校仍前来请求他担任领导职务。其后为教育实践家、珠海大学校长江茂森竭诚邀请，担任该校新设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到职之后，他殚思竭虑，举凡厘定研究所专业课程，罗致知名教授，编辑《珠海学报》，无不躬自为之。

罗教授于珠海书院十年间，学术文化活动频繁。一九六八年八月，出席台北阳明山华冈第一届国际笔会会议，宣读其论文《元明二代中国与忽必漠斯之交通》。一九六九年七月，赴美出席犹他州盐湖城之世界载籍会议，会期一周，提出论文一篇。^①《The Extent and Preservation of Genealogical Records in China》^②《Chinese History Through her Genealogies》。会期前后，他曾到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及国会图书馆参观和阅览中国族谱。一九七〇年六月，他以国际笔会香港分会会长身份，赴汉城出席国际笔会。后偕子罗康飞日参观博览会。一九七三年十月，出席台北召开之全世界客属同乡大会，并作专题演讲，题为：客家源流及其社会背景与影响。翌年十月，世界客属总会在台北成立，他又应邀于成立典礼上作专题演讲，题为：客家源流考。世界客属总会在香港设联络处，他担任首席召集人。

一九七五年七月，罗教授偕夫人朱篋第三次访美。他先抵罗省，曾先后应珠海留南加州校友会

和中山大学同学会宴请，作了讲话。复往加州大学参观，发现加州图书馆中日藏书部分有所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中国文化论丛》、《兴宁先贤丛书》一至四册。随后由其在芝加哥任仁爱医院病理医师之武儿（美国医学院士）陪同至三藩市大学礼堂，参加华人历史学会学术会议揭幕式，并接连作了题为《早期留学美国之容闳与中华民国创立之关系》，和《清末驻英公使梁诚在中美关系与教育发展之贡献与影响》的二次演讲。接着抵芝加哥，由其子罗武及媳妇、女儿和女婿陪侍参观惠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同样发现该馆藏有其著作：《中国族谱研究》、《国父家世源流考》、《中夏系统中之百越》、《百越源流与文化》等书。并藏有颇为齐全之《清华周刊》，其一九二八学年度任周刊总编辑时之卷数与期数均无缺损。随之还参观了芝加哥博物馆、芝加哥美术博物馆。后飞佛罗里达，下榻其长子罗文寓所，盘桓一周，参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图书馆，在该馆发现其早期著作《粤东之风》、《刘永福历史草》、《国父家世源流考》、《民俗学论》等书皆备。一九七二年，珠海书院为影印《广东文徵》，江茂森校长就商于罗教授负责校勘，他贾其余勇，尽力以赴，惜校勘未竟，而遽归道山，令人痛惜。

数十年来，罗教授虽寄居海隅，而热爱桑梓文化，维护乡邦文献之情，未尝稍减。一九五六年，与香港实业家、侨领袁五松、王荫平发起辑印《兴宁先贤丛书》。经十年之辛勤搜集、整理、校勘，于一九七六年底，第一集十巨册，先后辑印完成。一九七〇年，台北学生书局提倡影印各省府州县志，一以流通典籍，传播中国文化，一以阐扬先烈，激发民族精神，就商于罗教授影印《兴宁县志》。他即将自明至清与兴宁有关志乘：《正德兴宁县志》四卷、《崇祯兴宁县志》六卷、《咸丰兴宁县志》十二卷、《兴宁图志考》十一卷、《兴宁县山志》二卷，附录《明清兴宁县志考》交付影印，题名为《兴宁明清县志》，精装二册，并为之作序。以上诸书，皆为罗教授历年于各地图书馆、

书坊及诸家目录所搜集或传抄者。其后又为旅港兴宁同乡会创立会刊，并为其故友董作宾纪念论文集撰写《兴宁旧志考》、《兴宁明清县志考》。此外尚辑选《兴宁廿五家诗选》影印出版。

晚年罗教授患糖尿病兼肝疾，室人朱俊女士又于一九七六年，因脑血栓瘫痪，丧失知觉，卧床不起，以致心情沉重。一九七八年入春以来，他体质日见虚弱，精神益感不支，数次入院检查，发现肝硬化，虽多方治疗，而药石罔效，不幸于四月二十日九时病逝于浸信会医院，享寿七十三。噩耗传出，香港大学、珠海书院、珠海文史研究所等五十四所高校、学术团体、宗教团体、校友会、同乡会等单位及江茂森、黄麟书、张宽、马蒙等一百廿六位学者、专家、名流、侨领发起组成「罗香林教授治丧委员会」，在世界殡仪馆治丧，四月二十八日，由香港笔会在九龙红磡世界殡仪馆举行公祭，前来参加丧礼之各界人士不下万人，祭礼庄严肃穆，气氛哀切。四月二十九日，假九龙窝打道真理堂举行安息礼拜，随即出殡，安葬于粉岭崇谦堂坟场。佩黑纱前来执拂者甚众，备极荣哀。

罗教授一生，热心基督，曾任基督教香港崇真会粉岭崇谦堂长老、副主席、区教育部长。嗣后又任香港崇真会副会长、会长。一生乐于服务人群，无论对国家、对社会以及同乡、同学、同事、亲友、学生，无不爱护备至。凡有困难，莫不悉力相助。对后学青年，提携奖掖，劝勉有加。对人胸无城府，从不妄加批评。此外罗教授在港热心社团工作。其领导之社团计有兴宁同乡会、罗氏宗亲会、世界客属总会、香港笔会、清华同学会等单位。

罗教授毕生从事高等教育，培养青年学子，发扬祖国学术，弘扬民族精神，沟通中西文化，卓有成就，足为后人景仰。

客家源流考

羅香林

一、 結論

記得在民國元年，即一九一二年，英國長老會和美國浸信會，在汕頭舉行關於宗教的會議，有一位英國教士貝爾氏（*Rev. Campbell*），因為曾在客人住的地方，傳教多年，見聞確切，特地在會議席上報告客家的歷史和現狀。（註一）。他結語說：『客家人比城裏人勇敢，富有特立獨行的氣概，渴愛自由。……滿洲人入主中國，客家人降服得最遲，並且曾經一再起兵反正，第一次就是太平天國的事，第二次就是（這世紀內新近的事）。』

『客家人確是中華民族裏最顯著，最堅強有力的一派。他們的由來遷徙，種種經歷，確替他們養成一種愛種愛家的心理，同仇敵愾的精神，對於前途中華民族的奮發和進步，客籍人的貢獻，將見一天大似一天，這是可以斷言。』

後來貝爾氏又把這個報告印成長約十頁的小書，叫做「客家源流與遷移」（*Origin and Migration of The Hakkas*）。（註二）。這是英國教士們，有眼光的，明白客家的歷史和現狀後，所得的說法。

民國十三年，即一九二四年，美國耶路大學教授韓廷敦氏（*Elsworth Huntington*），著「種族的品性」一書（*The Character of Races*），裏面專門論述中華民族的，占有四章，（註三），於客家的特性，尤有深切的論述。他說：

『客家人的歷史，很值得仔細的研究。許多有眼力的人，不說過麼，他們是今日「中華民族裏的精華」。他們的毅力，愛清潔的習慣，對於婦女的尊重，和教育程度的卓越，都是難得的特點。他們和比他們早到南方的移民，就是現在圍着他們的土著，很不相同，好比這些比較進步的南方土著和現在還在北方的中國人的不同一樣。……客家人要不是因為荒年的困苦和外族的壓迫，大概也不會離開北方的老家的。在這層上我們確有相當書面的證據』。

「當他們遷移的時候，自然淘汰的勢力，一定很活動，逐漸把懦弱的，重保守的分子，收拾了去，或是留在後面。所以凡是能夠到達新地方的分子，都是比較有毅力有才幹的」。

「關於客家人的情形，第一件可以注意的事，便是他們的方言，他們說的實在是一種官話，和四圍非客家人的話很不相同，但是很像現在中州河南的話。客家人原出北方，在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來」。

韓廷教教授於人文地理學，最負盛名，這一種族的品性一書，更是他精心結集的著作。這是美國學者們，明白客家的特性和關係後，所得的說法。

反觀中國學者，對於客家的現狀和特性，能像良韓二氏「深切著明」的，却很少。這一半是因中國學者，比較少注意實地的考驗，少從事歸納的研究，故雖有關於客家問題一類的論述，然除一二關於客語的實地調查外，大率亦多長於文詞的勝美，而缺乏科學實證的精神。筆者於民國二十二年，即一九三三年，曾作「客家研究導論」一書，（註四），雖篇幅較良韓二氏論述客家的文字，多得多了，然關於客家特性的分析，也未能有超過良韓二氏的說明。這可知良韓二氏的說法，直到現在，還是研究客家問題的重要文獻，不能不特加注意，而感謝其啓發的功能。

從良韓二氏說法分析，可得幾種認識，或幾種意義：第一，這所謂客家是中華民族裏的精華。第二，這客家是從中國北方遷移到南方來的。第三，這客家有所由生存發展的特性。第四，這客家的方言，是比較近於中原語音的一種官話。

這四種意義，自然良韓二氏，也曾略為舉例說明，不過限於篇幅，只是發其端緒，未能窮其幾極。尤其是關於客家先民自北方遷到南方的經歷，幾乎牽涉中國歷史的全部，二氏說的，還是不夠，必須更為翔實的考証，方能把真象盡為說明。

其次，客家特性的由來，固然頗受因展轉遷移而起的選擇與優生的影響而成，然而與其居地分佈的環境關係，亦不無相當的影響。良韓二氏於客家居地的分佈，說的還是不夠，還得再加補充。

復次，客家方言，固為近於中原語音的一種官話，然而中原語音亦是以時變遷的，究竟客語為近於何一時期的中原語音？實在還有檢討的必要。這是中國歷代語音或音韻沿革與客語關係的問題，非三言兩語所能判定。而欲為檢討客語的性質，又須先為

分析其聲紐韻部音素與詞彙等。近人研究客方言的，或從音義訓詁入手，以說明客語與古語的關係，（註五），或從實地調查入手，（註六），以分析其聲紐韻部及音素。究之二者所得，仍須互為參證，方能有所發明。這點也得再加補充。

筆者昔年著「客家研究導論」時，嘗欲就客家各問題，各為蒐集資料，撰作專書，而綜合為「客家研究叢書」。世事倥傯，久無所就，真不勝慚愧！茲不揣淺陋，依上述各點，試就已有資料，略加比證，撰述「客家源流考」這篇論文。這是預計中「客家研究叢書」的一種，還是未定的初稿，希望客家人士及國內外專門學者，惠予指正，或賜寄有關資料，俾得以時補充，那就感激高誼，非言語可形容了。

附 註

（註一），長貝爾氏（George Campbell）演講詞見上海出版的英文「教務雜誌」（China Recorder N.VIII, Shanghai）。

（註二），長貝爾氏關於「客家源流與遷移」演講詞之單行本，後被聘廷教教授（Jillsworth Hongkongen）摘要採入其所著「種族的品性」（The Character of Races）書中。民國十二年友人鍾魯齋先生曾將長氏原文譯成中文，載「旅滬嘉應學生會」所出「嘉應」第一卷第三期。

（註三），韓廷教教授「種族的品性」一書為權威著作，出版不久，即售罄歐美，其關於中國民族之四章文字，後由翁光旦先生譯為一書，題曰「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一九二九年出版於上海新月書店。

（註四），筆者所著「客家研究導論」約二十五萬字，民國二十二年希山書局印出初版，二十七年由新架坡客屬總會再版，日本昭和十六年台灣銀行調查課長有元剛，復為譯成日文印行。

（註五），佐藤雄一方言「一類方言熟語的彙集或訓釋方式」著錄客家方言的，首為黃釗「石竈」一微，此方言，次為溫仲和等纂「嘉應州志」的方言，更為蘇桓撰「客語本字」等書，家語共（編次）先生使客方言訓釋的大成，著「客方言」十二卷，最負盛名。

（註六），友人王力教授纂著「兩粵音說」一論文，見「衡雁學報」一卷五期，其關於客語方面的論述，蓋即根據伊鄉西河白縣客語的調查而著錄的。近年中央研究院某君，復調查四川華陽縣之客家方言，其研究報告，亦甚翔實，但因華陽客家本遷入較晚，其客語已略有改變，故不以他為客語的代表。

二、中華民族的構成和演進

「客家是中華民族裏的精華」，也可說是中華民族裏的一支，所以在未有討論客家的源流和組成以前，須得先把中華民族的構成，及其有關的事變，說個明白。因為這是客家先民所由遷移及其系統所由組成的先決問題，不把牠先行說明，對於客家源流和組成的問題，是不易考述的。

中華民族的人種來源是發祥於中土本身的。（註一）。根據研究的結果，在史前時代，這發祥於中土的人種，因為分佈相當的廣，各以應付特殊的環境，以及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逐漸演進，形成了五個重要的民族集團。（註二）。這五個民族集團，雖說遠的來源相同，然以各有其分佈的區域，各有其傳統的習尚，而其各別的特性，也隨而成立。現在把這些民族集團，略為分折一下：

其一為夏氏族集團。這集團原分佈於今日川陝岷山和岷江流域一帶，（註三），其後分為三支，北上一支，分佈於陝西的漢水上游，和渭水流域等地。其西南一支，分佈於滇黔桂粵閩浙等地。這集團的文化特質，一為弓矢的使用，特別發達，一為城郭的發明與運用。而這西南一支，後來又演稱為戎，亦書作越，（註四），這就是因為他們善於用戎而得名的。他們更分佈於接連滇桂的邊徼地帶。

其二為羌氏族集團。這集團分佈於今日青海西藏等地，及西康，甘肅，陝西的一部分，以及接連西藏的邊徼地帶。（註五）。其三為狄氏族集團。這集團分佈於今日新疆，寧夏，蒙古，綏遠，熱河，察哈爾，及山西河北的一部分，以至於接連蒙古的邊徼地帶。（註六）。

其四為夷族集團。這集團分佈於今日江蘇北部，以至安徽，山東，河南，遼寧，吉林，黑龍江，以及朝鮮半島等。文化的特徵為弓矢的發明和運用。「夷」就是「帶弓之人」的意思。稍後分佈於遼吉黑等地的夷，又演稱為「東胡」。（註七）。

其五於蠻氏族集團。這集團分佈於今日湖北，湖南，江西，和廣西，貴州的一部分，以至中南半島的一部分。（註八）。